

# “拆迁富翁”的未来隐忧

“拆迁致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对转型农民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那么他们因“冲动消费”,将有返贫之虞。

记者5月28日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成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致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 京郊农民的“拆迁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接合部及郊区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被拆迁的民房(资料图片)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向记者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一四五十万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期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不愿意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与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致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

夜致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 “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5月18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了小区停满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以上,降低点要求,至少也是要15万,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价了。”

也有人买下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5月1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约见了正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黄通。

据黄通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通苦恼地向记者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在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10多万。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地“烧钱”。

记者调查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致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致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

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让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

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个村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 “拆迁后”保障体制需跟进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高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经销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强磊教授表示,政府对转型农民应加强正确的消费指导,政策规划上要科学。他建议,可遵循“先生产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费”的原则来实施,如可尝试分期拨付拆迁补偿款。

“有些农民,人上楼了,而思想观念还没有上楼。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还任重道远。”高建刚说,“同样,让转型农民的资产保值增值,是政府获得农民信赖的基础。这对于政府来说,压力不小。”

4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受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邀请,北京一家金融理财规划师来到这个小镇,为200多名妇女举办“家庭科学理财”讲座。

“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的启发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时隔一个多月,当时参加听课的一位妇女还很兴奋。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德广对记者介绍,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大兴区从一年前开始探



被拆迁的农民一夜暴富后买的高级轿车(资料图片)

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案,即“就业有保障、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有岗位”。

“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没有了土地作为缓冲,转型农民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在增加,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必然降低。”强磊说。

目前,大兴区专门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劳动力一次性奖励、创业扶持等八项政策,并安排了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在资产增收方面,大兴区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确保集体与农民的长期收益。“让失地农民的财富有造血功能,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张德广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的根本。

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保障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100%。

此外,大兴区还对原有村集体组织进行梳理,明确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各自岗位职责、工作重点、任务标准,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创新组织服务形式。加上大力挖掘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使农民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实际需求在转型过程中得到及时掌握和反馈,排除和疏导不少基层基本矛盾。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设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赵春燕认为,这不仅需要与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还要为农民转型设计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强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和观念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克服由于以往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束缚,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适应市民生活。

据《瞭望》

## 大众教育时代 该如何关注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每到高考前后,都会引发全社会的集体性议论,今天我们需要换一换视角审视高考呢?

高考已经走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精英教育渐次远去,大众教育不期而至。数字显示,今年北京高考录取率将达到创纪录的84.6%,比去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除了北京,浙江等地的录取率也超过80%。教育部提供的数字则称,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比去年增加近7个百分点。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打量高考就应该多一些平常的心态,就应该将目光放在宽进严出上,大学不能一考了之,不能为了扩招而扩招,否则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957万名,从绝对量看实属不少,但比去年减了65万。笔者注意到,黑龙江省今年高考人数比去年减少2.9万人,浙江比去年减了2万,陕西减了2.6万余人……切莫对高考人数减少掉以轻心,人数减少背后隐藏着不少令人反思的问题。要知道,这是2008年之后的连续两年下降,明年是否继续下降,值得关注。有关部门称,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人数减少。毕业生为何减少?是不是有些人不愿意读高中,其中与读书无用论有无关系?曾有媒体报道,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地方泛起。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有人宁愿上高中考大学也只能上专科,难以就业,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还有的痛感于畸高的学费,没有钱继续读下去。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学校迫于升学率的比拼压力,在高考前召集那些升学无望的考生,让其做思想工作,劝其放弃高考。无论是什么情况,考生减少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无论考生人数下降多少、录取率提高多少,一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是高考公平。不公平仍在侵蚀着高考的肌肤。一项调查显示,高达七成的网民认为身边发生过不少高考不公平现象;仅有3.1%的网民认为,身边未发生过高考不公平现象。这一数据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但绝非无的放矢。高考舞弊事件之后,被顶替现象成了连续剧;不合理的高考加分,成了权势家庭的狂欢盛宴;至于一些学校和老师在利益驱动下,集体作弊亦非新闻……教育是社会公正的“调节器”,教育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公正毁于一旦,而高考公平是确保教育不公最重要的体现之一。不管承认不承认,高考还是不少人的命运转折点,如果不能很好地捍卫高考公平,社会板结化就会加重,穷人的上升渠道就会堵塞。除了高考公平之外,尚需关注的一大命题是高考改革。高考不应是沉重的,高考是单纯的,但承担着复杂的命题。在大众教育时代,我们既要关注考生,更要关注高考背后的教育公平、教育改革以及大学使命等等。

石川

## 教授放炮源于话语权被滥用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在解读即将施行的《侵权法》时多次炮轰记者没文化(《人民日报》除外)。并且还说医院死人是正常的,救死扶伤的口号不对。(6月6日《南方都市报》)

无论是“99%的上访户是精神病人”,还是认为医院就该“竖着进,横着出”,孙东东的学术论断除了冷漠,其内容更像是个人的臆想。“99%上访专业户是精神病人”是当初孙教授“负责任”说的,但草率的道歉之后,却一直未见公开“99%上访户是精神病”的出处和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访者中有多少精神病人暂无考证,但维权百姓“被精神病”的却屡见不鲜。救死扶伤口号不对,赤裸裸地“医院死人正常”更是让人寒心。

而孙东东“记者都没文化”的论断,更像是权力者的训斥,甚至是一种私愤的宣泄。只因一家媒体惹他不爽,他便抡起道德的大棒向一个群体叫阵,学术的熏陶下,说话也许可以更严谨点。至于吊诡的“除《人民日报》之外”,情感深厚也好,避免尴尬也罢,但客观地讲,评新闻奖这个活儿,孙教授还真不是权威。

网友称孙东东为“大嘴教授”。虽有泄愤的情绪在里面,但如此形容并非全无理。为什么教授会变得如此口无遮拦呢?除了学术浮躁,话语权被治学者滥用,恐怕是滋生教授傲慢和傲慢的症结所在。

“大嘴”教授的武断与傲慢背后,隐藏的是孙东东们对话语权的误解。因

为在话语权到底是权力还是权利辨别上,他(们)选择了前者。而其言论之所以显得冷漠缺乏温情,原因便是把话语权看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看孙东东,为何不像是个学者,反倒像某个爱训斥人、独断专行的官员的原因。

话语权到底是一种权力还是权利?前者,成就了孙东东们的浮躁、武断和傲慢;后者,成就了学术的虔诚和严谨。由此看来,孙东东们的大嘴和傲慢背后是话语权的滥用。而话语权滥用的根源却是持有者对语权的误解。理解了话语权的作用和意义,治学者以后在使用话语权时也许会严谨一点、谦和一点。

珍珍

## 新闻漫画：“被死亡”

据报道:河北任县的韩福平从2001年被分配到旧周学区当教师后,没有上过一次讲台领取过一分钱工资。直到2006年她才意外得知,2004年年底,她已被有关部门以死亡为由取消了编制。据任县纪检调查,从2001年到2004年,她的工资被原旧周乡财政所工作人员用作乡里的招待费用。

罗琪作



## 为冠军加官强化了官本位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三名奥运冠军那傲伟、唐功红、刘春红连同该省其他6名奥运冠军被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提拔晋升副处级领导干部。6月5日,这九位奥运冠军结束“岗前培训”,即将走马上任。(6月6日《羊城晚报》)

之前的诸如“体而优则仕”,甚至“体而优则博”,顺便再延续“体而优则仕”可谓早有耳闻,只是这些“神话故事”上演的数量没有烟台这般庞大罢了。不仅是集中,而且一次性“批发”九个奥运冠军戴上“处级乌纱”,起点与级别均创新高。这难免会挑动公众的两根神经。

首先挑动的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神经。我们一直片面坚守竞技体育成绩至上的思维不放。“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体育的首要内涵是增强公民体质,可此要旨一再被年复一年的“夺金”冲动挤压到孤独的一角。

搞到金牌,明星们随之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多重高奖,奖金、豪宅、学位、地位、官位等,几乎全部加身。一些地方将金牌块数作为唯一量化国民体育成绩的“硬指标”,公共体育一步步弄成了面子工程。孰知,这最终让一些冠军整天生活在飘然中不能自拔,最终纳税人的钱把体育明星变成了难以接“地

气”的富人或“官人”。

第二根被挑动的神经是我们干部用人体制之弊。按理说,公共管理领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公仆,需要多少公仆,这应是公开而公正的,不会随着奥运冠军的多寡而随意变化。公务员行业属公共服务职业,公仆服务的技能与水准与是否曾夺过冠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9名从事不同职业类型的冠军,呼啦啦一起当“处官”,如此打开“入仕”大门,形象而直白地说明了,我们的官场文化里,还一直将“仕”看成是一种搞劳冠军的商品而非服务于民的职业精神。

仲由

## 也说行政级别的取消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发布,该纲要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焦点,是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也就是说,高级医生,处级教授,正厅级大学校长,这些稀奇古怪的头衔将在流行了60年后,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笑话。行政级别是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管理方法,做公务员就是一个职业,就如同从军服役、做生意当商人一样,是一种可以转换的选择。但自1949年以来,行政级别成了无数中国人毕生奋斗的目标,一批批社会栋梁在科、处、局、市、省……的阶梯中耗尽年华。

行政级别是“有序的”,于是各出奇招“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些堪称现代职场现象的东西诞生了。股级干部消失了,这是公务员的共同利益。科员到科长一般是三年,如果提前提拔威胁太大。处级位置让一个人呆8年以上,那基本就是判了他的政治死刑。光怪陆离中,最丢人的是59岁现象,没有前途希望的人拼命捞人生最后一票直至把自己送进去。

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行政级别的思路,是这些单位在选拔人才时也有行政级别要求,结果制约了人才的提拔。科研院所高校医院,是搞研究出成果的地方,如果天天从副处长提处长,处长中选拔局长,岂不成了衙门。

行政级别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如果真的没了,很多人会很失落。他们的人生将没有定位,他们的待遇将失去参照,他们的奋斗将没有目标,他们的灵魂将失去安慰。

医院高校的乌纱没有了,实在是没有的太晚了些,不过总算还是取消了。只是取消的还不够,远远不够。中国现在官衔最大的作家是谁?铁凝。这位以独身美女闻名的中国作协主席,是名正言顺的正部级。写小说写到了相当于省长部长的官位位置,实在是大有中国特色了。这个官衔可也是货真价实的,现在铁凝享受部长的行政权限,将来退休了也要参照这个级别获得相应的待遇。

如果中国大地上仅有一个部长级作家也就那么的了,全当社会发展需要。问题是,铁凝的副手必然是副部长,直系下属必然是司局。各省作协主席当家是正厅,下面必然有帮处长。于是中国大地上冒出一帮冠冕堂皇的作家,这一现象已经持续60年。

有厅级作家主持的作协,就有同样级别作家操持的文联。有管运动员的体委主任,就有负责国有矿山的官员企业家。中国大地上,有数不清的官员在奔忙,行政级别是他们的护身符、救命宝和终身枷锁。非然